

周易的生命哲學與生存發展論 ——兼論西方知識形上學之轉向[§]

魏元珪*

摘要：

本論文主旨旨在闡揚周易哲學中生生之理，尤以易傳精神為主，說明「易」乃知幾觀過，絜淨精微之學。而非傳統之卜筮與占私人吉凶之術。

本文就歷史發展之定位，言明周易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與發展，以及在當今世界文化中之價值。文中兼論傳統西方知識論之蔽，哲學在當今宜予轉型，勿固閉於以知識論為中心的研究。

自當代廣義相對論與量子論興起，對真理之了解已不同於傳統知識論之陋見。知識之真假，乃因參照系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答案，何者正確，難以定論。總要經過歷程之論證與檢驗始可成為定論；並非傳統一維邏輯所能確認。

周易哲學是多元辯證關係思維，對當今之物理哲學並無扞格，猶對當今文明之困頓，有發聲振聩之功用。

關鍵字：生命、生存、發展、天人和諧、共生共榮、知識轉型、易道生生。

*本文送審日期為 93 年 2 月 10 日；接受刊登日期為 93 年 4 月 30 日。

*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。

周易的生命哲學與生存發展論 ——兼論西方知識形上學之轉向

魏元珪

前言

《易》道是中國前人的智慧結晶，《易》，蘊藏了人對自然宇宙，和社會人生的無邊智慧，指導著人們日常的生活，做為人生旅途上的指針，更是歷史發展，社會生存和一切變化法則的藍圖，是人們須臾不可離的一本書。

今人以《易》在古代夏、商時期不過是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之屬，即在周初亦不過作為「卜辭」而已。按雖云「卜辭」，究竟與單純之占圖，並玩弄機遇之或然率不同。「卜辭」中藉民謠、歌訣、詩頌、或俚語，以及一些歷史典故作為暗喻，以啓迪問卜者之疑難，此中含有深刻哲理，並非悉如古今寺廟中，廟祝之輩所撰擬之籤語，以之區分為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。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。下上、下中、下下之讖文，以為宿命論式的判斷，令人難以摸索。《易》是中華民族先聖、先哲所留下的生命體驗，並非不過是「卜辭」所可一語道斷。迄春秋之際，孔子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為孔門教學之典範，在這些《竹簡》中含有至高的教育原理。《易》道潔淨精微、疏通致遠、尤為無上之智慧。嗣後儒門學者不斷研《易》，推衍為《文言》、《說卦》、《序卦》，以及《繫辭大傳》等，對《易》之原辭加以哲理性的發揮，遂蔚為一部涵蘊深刻的生命哲理，和人生的大寶典。今之治《易》者，豈能尙以不過是區區「卜辭」而等閒視之。

關於《易傳》之形成，論證者多有所偏。事實上，乃是綜合儒、道先哲們的歷史智慧與結晶。早在孔、老之前，已有山村老叟、和遁世隱者們，匯集了歷代人世經歷中的智慧，加以彙編。孔老之說並非毫無淵源，而是集夏、商、周先世之演變，結合前人之睿智，而匯為智慧之箴言，殆非孔老二人所獨創。本文不欲為《易傳》之集成作考證，所強調者，所謂《易傳》乃集先民集體之智慧，由後人編集而成。其中不乏周公旦、召公、奭公，以及孔子和先儒們的智慧，更加上某些隱世道者所附加的雋語。《易》道無窮，各人因所好而定《易》之內涵，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但《易》之為《易》，自有其客觀之準繩，並不因某些主觀之取捨而有所偏差。《易繫辭傳上》說：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」（《繫上》第一章）又云：「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，悔吝者憂虞之象也，變化者進退之象也，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」（《繫上》第一章）由是可知，《易》本是知幾、觀變、唯變所適的學問。吉、凶、悔、吝惟在其時變之適，以及明其時空中的定位。卦象之變化，不過用為自然變化中象徵之圖象，而得失之象，唯賢者知幾，並如何把握之、運用之，而不可視為典要。《繫辭上》所謂：「子曰：夫易，

何爲者也？夫易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。」（《繫上》十一章），由是觀之，就孔子而言，《易》有兩大任務，一是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教人如何了解自然世界，開發大自然之資源，以供民用。二則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斷天下之疑。

因此，《易》有物質層次的研究，也有心靈層次的探索，前者在使人明天地之究竟，探自然法則之奧祕，以便如何駕馭之，以創作天下之廣業。後者在乎心靈境界與生命之安頓，使人廣其識見，以成性存存，入道之門，以達不疑、不惑之至境。易言之，前者重理則研究，使人成為智者，而後者則重德性之培養，使人成為仁者，這正是孔子仁智兼修的教育原理。所謂成乎智者，乃使人聰明睿哲、凡事通達，高瞻遠矚，行事權宜。至於成乎仁者，乃使人擊淨精微，顯道成德，俾成性存存，以保上天所賦人們本性之良善。總言之，《易》道在乎變化，而變化在乎生生。所謂生生者，教人們凡事當思生路，勿自陷於固蔽之中，所謂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孔子謂：「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。」（《繫辭上》第九章）《繫辭》又云：「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、通其變，遂成天地之文，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，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于此。」（《繫上》第十章）按《繫辭傳》所云，說明了天下之變，宇宙之運，本有其序列，不容紊亂，惟決定序列者是數的安排。因此，《易》也可說是明數通變之學，非極其數，不能明天下之象，亦不可即萬物之理。先聖以《易》明於天下之道，而察於民之故，而觀其會通。在仰觀、俯察中，知權達變，把握宇宙、自然和社會人生之脈動，而爲千古研幾，通變，達時之學。

一、生生之謂易，天地之大德曰生

中國哲學精神，不論儒道二家皆在以「民得天地之中而生」¹，如何返「中」於天或升「中」於天，以「民志」與「天志」，「天聽」與「民聽」，「天視」與「民視」相互合契，這是中國哲學的關鍵所在。中國哲學本無西方傳統知識形上學之思路，去探詢何謂「實體」（Substance），亦未將「現象」與「本體」，「主觀」與「客觀」，「形上」與「形下」，「能知」和「所知」，相互對立，去做「概念」和「名句文身」的分析。中國哲學一方面教人如何安身立命，求生命之所適與安頓，正如張載所謂：「生吾順事，沒吾寧也。」²另一方面教人如何開物成務、冒天下之道，以成天下之業，並非終日袖手談心性，泛論「內聖外王」之理。

中國哲學從不把「自然」和「人生」二分，人在宇宙中，就是宇宙的一部份，天人本不二，

¹ 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：成子受脢于社，不敬。劉子曰：「吾聞之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。」。按魯成公十三年爲公元前五七八八年。社爲神廟，即社稷之廟，古代將出兵在社神廟前接受祭肉。不敬，謂在典禮中不敬神明，不敬業從事。劉子即劉康公。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」，謂百姓稟受天地的中和之氣而降生，故當常保此中和之氣，勿使偏差。古人以爲天地有中和之氣，人得之而生。一說「中」爲至正大中之理，乃人所秉之氣，必常保之勿失。（參楊柏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）

² 見張載：《西銘》《宋元學案·六，橫渠學案》未句。此謂：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，沒則安其心志而不亂，是乃始終聽命於天地，而爲天地至孝之子焉。

何來扞格。人在宇宙中有其位置，中國哲學未曾強調作為認識上的「主體的我」，因認識本是主客涵容的。不像笛卡爾（René Descartes 1596-1650）那樣，把「認識的主體」孤立起來，作為一切認識的媒介，去主張「我思故我在」。人在宇宙中本極渺小，不足稱為「認識的主體」，一切都在變動之中，「自我」本是一種成長的過程，本無一成不變的自我，也決無作為概念，永恆不變的「我」。中國哲學本不重知識形上學，亦不把人之存有與世界之存有相互對立。在整個宇宙中，本無物我之分別，更無主客對待的餘地。中國哲學也從不把「自然」視為人類征服之對象，未以戡天役物，開發自然為人生之要務。《易》道教人「保合太和」，人與自然相倚為命，人破壞了大自然，無盡止地开发利用，最後必招致大自然的反彈，以致利用喪生。今日歐美諸國，受西方傳統文化向外開拓之影響，祇知不斷開發資源，利用厚生，馴至竭澤而漁，生態破壞，而達嚴重的地步。當今西方文化已走到了文明的極限，其結果是無限地利用、喪生。

中國哲學本乎《易》道生生之大德，人與自然和諧，人與族群和諧，人與萬有和諧，本乎「萬物與我並生，天地與我為一」之精神，彼此和睦相處，以達「各正性命」，「保合太和」之境《乾文言傳》。中國古人極重天地中和的原理，不論在儒道二家的經典中，都極力提倡生命網的平衡發展，以保持人與宇宙自然，以及社會人生的大和諧，這與西方達爾文、赫胥黎輩所倡之物競天擇，弱肉強食之文化不同。

中國哲學一方面重開物成務，另方面更重成性存存之理，《易》道所云：「冒天下之道」，即在教人了解自然世界，並把握其演變之法則，綿綿若存，以供民用，並極力反對強力推展，相互排擠之效果。中國文化向來循和平與發展之路向，以求全體之生生，這種教化主要來自《易》道生生之法則。所謂「生生」，即教人們走向生路，舉凡歷史與文化要向生處發展，勿自蹈死路，以免招致物極必反之命運。

《易》道主張宇宙和自然間，人與自然間皆彼此旁通，相互形成一不可分割的生命之網。主張此存彼存、此立彼立，此亡彼亡，此滅彼滅的相應法則，所以主張共生原理，而摒棄惟我獨尊之信念，這本是《易》道生生大德的教示。可惜人類自受西方戡天役物思想之後，在物競天擇的影響下，人人自求多福，排斥他人與他物，以致社會矛盾衝突，自然生態大受破壞，這本非《易》道生生之教訓。

二、論西方傳統知識形上學之蔽

西方哲學溯自亞里士多德以來，猶自笛卡兒與洛克以降多囿於知識論與認識方法之探討，皆以概念為主，去探索「現象」與「本體」、所知與能知、主体與客體、形上與形下、心與物之二元論証，這種哲學專注知識之分析，循知識論之探討去講究知識如何可能，把人與客觀世界對立起來，去探索「自然」或「存有」的普遍規律，以追求「實體」或「本體論」作為哲學最高的目標。這種追求「形式」與「本質」，「實體」與「現象」的研究，透過概念敘述，去捉摸千古以來哲學上的概念遊戲，這種哲學思維到了黑格爾（Hegel）唯心論可謂已達登峰造極。當代哲學已漸趨反知識論為中心的路向，自量子論、廣義相對論

等皆以觀察參照系為認知之準則，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，所謂「知識形上學」的固蔽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釋認識過程，其結果卻陷在概念性的文字魔障中，終究甚麼都沒有說明、只是把最簡單事情，說得愈複雜而已，最後竟陷在「名句文身」中而不能自拔。

哲學自海德格 (Martin Heidegger 1889-1976) 以來，業以「存有論」導向去引領知識論導向³，如今，哲學所面臨的，不再是去描述概念的遊戲，而是面臨當代人類文明的困惑，要為人類去尋求文化的出路，以及文明的轉向。哲學不在乎去解釋知識的起源與究竟，而是面向活生生的存有，去探索生命存有之究竟與價值。

面臨廿一世紀，哲學必須深刻地反省，在文明發展的極限中，如何去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把脈。更在科技文明和生命科學，所帶來的全球問題，以及市場經濟的壟斷危機中，如何將人從物化和深刻的矛盾中救拔出來。

儘管在西方近代有尼采(Nietzsche 1844-1900)叔本華(Schopenhauer 1788-1860)，以及若干生命哲學家如柏克森 (Henri Bergson 1859-1941) 狄爾泰 (Wilhelm Dilthey) 齊美爾 (George Simmel) 等倡反理性主義，以及反亞里士多德以來傳統之形上學，也有海德格之「在此存有」 (Dasein) 之倡導，以迄現代對「存有論」、「認識論」、「邏輯學」等之反思，就哲學和其根本性質上而言，似已改弦更張。這是哲學史上一大變革的時代，意味著傳統哲學的終結。⁴當代哲學正面臨人的生存路向和價值的決定，是哲學對人類自身存在的關切，也是哲學面對價值的取向，以代替過去知識形上學的趨勢。人類因無法取得存有的普遍規律，乃去探索何謂「實體」本身；人當今更面臨了人類「生存」的矛盾和困境，哲學似宜由抽象的、概念性的探討「實體」問題，進而轉身去研究如何實踐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問題。傳統知識論思維路向是概念性的和思辨性的 (speculative)。所謂哲學似乎是「概念」的遊戲，以及邏輯必然法則的反思。當今哲學所謂之真理已不再局限於「主體」與「客體」間的符合論⁵；因為「主體」是成長的，世上並無一固定不變的「主體」。就觀察而言，由於觀察者與觀察座標的差異，以及所設定不同的方法，自產生相異的觀察現象；因此，說明「真理」乃是「主客」的契合，是忽略了時空變化中的差異性。當代「生存論」的先驅，有歐洲的非理性主義 (irrational man) 或反知識論為中心的立場，他們皆立足於生命存有觀與人類社會共生的路向，強調生命存有之可貴，反對以「主客對立」和「能所二分」的知識分析路向。就當代神學而言，也逐漸地拋棄了中世紀承襲柏拉圖、亞理士多德、以及多瑪斯以來傳統形上學推理的原則，而要面對面地 (I and Thou) 與宇宙之真宰相互對話，拋棄作為哲學概念中的上帝觀。

³ 見海德格(Martin Heidegger)著《存有與時間》(Sein und Zeit)，第四節〈存在問題在存在者狀態上之優先地位〉。

⁴ 參新編《現代西方哲學》劉放桐編著，人民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六月一版。第五章，生命哲學，第十二章，存在主義。

⁵ 參[德]費迪南·費爾曼(Ferdinand Fellmann)著：《生命哲學》(Lebensphilosophie)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"Lebensphilosophie" Copyright © 1993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, Reinbek bei Hamburg 中文版見李健鳴譯《生命哲學》華夏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一月北京第一版。參該書引言：〈自我經驗和自我意識〉，以及第一、二、三各章。又參[法]柏格森(Henri Bergson)著：《時間與自由意志》(Time and Free will)中譯版，吳士棟譯，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七月四版。

傳統知識論路向，大體上涵蓋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全部西方哲學史，直到黑格爾哲學發展到了絕對概念的頂峰，各家皆以不同的指謂，去描述所謂「實體」問題，尤以黑格爾以「絕對精神」，去指謂存在的真理，可以說是在概念系統中，架構了極抽象的哲學範疇。祁克果則極力反對黑格爾的論證，以他所建構的不過是虛妄的概念系統。

當今，哲學正面臨人類理性的毀滅，與人類文明的極限，以及國際間相互競逐的危機。人類的生存與發展，已面臨汲汲可危的地步，傳統哲學的「宇宙實體」，無力於解決人間的紛爭，與思想的死結，抽象概念世界種種理念，不過是名言障，所有的名句文身不足以解釋哲學對人存有的終極關懷。

反思《易學》原理中確有生生之大德，足以為人類生存謀出路，教人類彼此間當如何調適，以尋得生機與出路，否則廿一世紀將是人類文化浩劫的時期，不但資本主義市場終將崩潰，而人類也將自毀於一己的文明。事實上，人對「實在」的研究本不全依賴於知識論性質的反思，知識論亦無補於物性之研究，人以抽象形式、邏輯範疇，自我設限地去編織一個理性王國的概念世界，結果卻掉在這概念漩渦中，不能自拔。

當今哲學的使命，不再是去闡釋知識的可能範疇，而是去面臨生命存有的關係，以及人類面對自我的價值，文化的發展，生活的意義，暨道德重建等各方面，俾重塑嶄新的世界觀、宇宙觀和人生觀。誠如《易傳》所謂的「成性存存，入德之門」的偉大哲理。

當今哲學所關注的焦點，擬從超驗世界轉向現實世界，不再迷醉於人類所自我設計的，有限理性王國之中。哲學應從探研宇宙本體轉向人類生存狀態、從尋求「最高原因」，「最高實體」的概念，轉向探究人世生存和實踐的方針。傳統形上學美其名為研究「存在之為存在」的究竟狀態，以為哲學的真實任務僅在探求一切實在背後的終極實體，殊不知自古迄今，各家各派，竭盡其所言，皆不過是「名句文身」，最後都落入名言障之中而不知所云。

從亞理士多德一直到黑格爾，所有西方形上學所指點的「存在」，都不過是些抽象的名詞，按當今物理哲學觀之，不過是一些陳言，不足為訓。且都日益脫離現象的因素，和現實人世的活動，將感性世界中的事物，超驗為概念性的存在因素，把現實世界超驗為概念性的存在，然後再去追尋究竟什麼是「實體」，結果「人」的存在竟然被遮蔽了，「此在」（*Da sein*）也被「概念」所模糊了。人的創造性和個體性，以及人的自由和價值都在概念世界的大海中消失了。人們眼睜睜地看著世紀的浩劫一幕一幕地上演，人類竟然無以為力。人被自己所創立的名句所愚弄了，而不知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」。人追求絕對理性或理念世界，在探究存在過程中，人們以尋求最高原因為哲學之大本，結果馴至本末倒置，竟產生了顛倒見，反將人類所面臨的生命問題，生存問題，束之高閣，人在當代世界中被疏離了。

海德格曾經說：「使存在從存在者中顯露出來，并對存在本身進行解釋」。⁶海德格至少主張回到存有論，而非永遠逗留在知識論的領域裏。海德格認為在所有存有中，最顯然

⁶ 見海德格著《存有與時間》第二章，〈弄清存在問題的雙重任務〉，及第一章〈存在問題的必要性〉及其他相關章節。參現代西方學術文庫《存在與時間》中譯本，陳嘉映、王慶節合譯，熊偉校，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出版，一九八七年·十二月北京第一版。

的是人自己的存有，人如何去維持人之存有的適當性，正是當今哲學的重要課題。

人的存在狀態不是常住不變的，正如《易經》所云：「惟變所適」。《易》道是從動態的，變遷的，辨證的觀點去看自然和人世一切的現象。當今，西方世界中，人的生命活動已被異化，人與人的關係，都建立在物與物的關係上，不是人支配物，而是物支配了人。所有人的個性，都泯滅在物欲之中，尤其在實際生活中，人世已充滿了無限的矛盾，遠勝過歷史上的往昔；因此，當今哲學的重要課題應由本體的定位，轉向人自身境遇和生存狀態的研究，俾指點出人類共存、共榮的智慧。人類的前途不單在戡天役物，終日征服自然，以及如何去消滅異己上花工夫。當今哲學應對人的異化，提出深刻的批判，並重構人的生存方式與價值問題，不再是以一種抽象的、超現實的方式去理解，和把握傳統的實體的問題。

在西方近現代的哲學中，祁克果、海德格等人，都針對哲學的生存論轉向，提供了不遺餘力的貢獻，人愈張揚「知性主體」，便愈引導出一強大的「客體」與之對立，而構成了西方哲學自笛卡爾以來的二元的分裂（Bifurcation）。

中國的傳統哲學本乎易理，向來包含著極豐富的「生存論」意蘊，一向主張宇宙和人生的和協與「生生不息」之道，並主張「道不離器」，「道在器中」，決不像西方哲學那樣，走向「心物」，「主客」、「能所」、「形上形下」之分割，把「本體」與「現象」永遠地視為兩橛，互不來往、並存有鴻溝。因此，宏揚中國哲學精神和《易》道的思想，正是當今哲學界的任務，不宜再循西方知識形上學之思路，而作無益的遐思。

三、當代哲學「求生存發展論」之導向

在所有「存有」中，人之「此有」（*Da Sein*）最為顯要，一切科學、哲學、知識、語言莫不由人之「此有」出發。進入廿一世紀，哲學將何往、何適？哲學之研究主題，以及關懷的事項究竟為何，這是當前文化所面臨的重要課題，要談論這一問題，先要解剖一下當前人類的處境，以及文化型態的走向，更牽涉到人類價值觀的問題。所謂哲學的「生存發展論」傾向，並非特別強調經濟價值，或市場經濟之重構，亦非著重所謂「知識經濟」、而是當人類被異化，文化被扭曲，價值被顛倒之後，人當如何發展自己的路途，去重建新的文化理念，所以一種面對廿一世紀的新文化哲學，人類生存發展之道，厥為當前極為緊迫的問題。哲學不是考古的堆積、更不是概念世界中的迷思，哲學應面向當代危機的文化意識，去作指路的先鋒。

真正的哲學必須是自己時代精神的反映和精華，是文明的指針和心靈。哲學在當代若不能做文化的靈魂，而任憑「知識經濟」一味地以謀取財富、資源，市場、利潤、消費，再生產、回饋，資訊、訊息、傳媒、廣告做為文化的中心，那麼人類心靈與文化將面臨枯竭與荒涼，而走向了文明的大沙漠，人心亦不得安頓，生命無法滋潤。人類頓成了純物性的存在，竟為了滿足純物性而生活，人生將面臨如何地乏味與枯澀的問題。中國哲學向來注重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；一個文化中倘無正德的嚮導，人人將盡成市井之偷夫。

生存發展論，本乎大易「生生不息」、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為出發點，俾能指點人類與萬有的共存的智慧。生存發展不僅指人類個體與群體之共生共榮，更指人與自然環境，

社會環境之調適，與文化價值之重估，開啓時代的地平線，培養嶄新的宇宙人生觀和世界觀。哲學不應再跔處在形上學中，去對理性主體作形上學之剖析。在笛卡爾的思維裡，人追求「神性實體」與「第一推動者」，以「我思故我在」作為精神上我思主體的超越性，追求培根以來知識就是力量的思維。西方傳統哲學以自我為中心，以理性思維為主軸，在工具理性的誘導下，不斷地開發自然，利用自然。在物欲與技術相互誘導下，競相爭高，結果竟造成了人為物役，道為技隱的物本文化，使人的生存模式外在化，文化速食化並膚淺化。西方哲學強調理性的結果，反落入無理性的深淵中，人類普遍失去了信仰，失去了生存的遠景和異象，終日只在現實中為所欲為，以資本主義文化所求的利潤報酬率為人生最高的指標，以致公義蕩然，人類生存方式，越來越嚴重地悖反了理性主義哲學的原則。

大易哲學的生存論導向本乎「天之大德曰生」，以求全體人類生存的智慧，抗拒強權主義和世界霸權者的獨佔性文化，這是現代人類應迫切思考的問題。

四、大易生存論哲學的內涵

中國儒、道、墨三家傳統哲學，本是傳揚「生生不息」、「生生之仁」、「萬物並生」和「兼相愛」的崇高境界。在《易》學生生之為大德的指導下，謀求天地萬物並生的和諧法則。生存的共有結構，是各族群和各生態網的平衡發展，生存主題是以全球性多元主體的差異為和融的聯結體，主張和而不同，同中有異，以求各文化族群的彼此和洽，抗拒霸權和獨佔性，更反對任何國家以世界領袖自居，誠如《易乾卦》所謂：「群龍無首」。各族群在交往實踐中，以商談，對話和溝通，以求多元性的和融共處，而非定於一尊。在相互理解之下，達成共識的合理性，探尋共同生存，相互依存之道。因為《易》道貴在旁通協合，這是生存哲學轉向的內在張力結構，促使人類歷史向世界文化大融合之途邁進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世界已早成為地球村，以地球村文化為主軸，去展開人類共存和共榮的生活歷程。

大易生存論哲學也是全球性各族群共存的文化哲學、價值哲學和道德哲學，更是「各正性命」，「保合太和」的生命共融性的哲學，也是全球各族群的「共命慧」。

當今世界各角落彼此休戚相關，生存需要的公共性、生存危機的威脅性、疾病傳染防患的共同性、文化網絡的互通性、公序良俗的迫切性、生存主題的全球性、反武器競爭和反霸權的正義性、生存境遇的全球性，都在在需要新的哲學觀去加以妥善處理。

哲學不再是空談「本體」和知識論邏輯的合理性，而是人類正誼相處的合理性，在生生之為大德的前提下，人類意識到，應如何著眼去籌劃未來的「可能態」設計，以及就人類境遇去深深地領悟人文的關懷。生存哲學應是規劃全球性領域內，人類如何建構一個新人文規範。

廿一世紀應是東西相遇的成熟化世紀，《周易》生命哲學，和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，將成為人類生存意義的哲學，因為中國哲學向來是「生存智慧之學」，是物質和心靈並重的高度文化的結晶。生存哲學讓人們從異化中甦醒，使人們超越動物環境的限制，讓人重新領悟，哲學當如何介入當代人的生活世界之中，並摒棄物性的束縛，使人恢復其貴生、

尊生，養生，以及爲己、爲人，成己、成人之學。

《易經》與《易傳》皆把宇宙看作是整體圓融、廣大和諧、博大旁通，天、地、人三才統貫的系統。所有動物、植物、昆蟲、鳥獸、山川、河流、海洋、山林、都是相互依傍的關係，彼此蕃衍生息。山川、河流、樹木、花草都與人息息相關，過度開發與破壞，都會回應到人類的命運上來。時令的配合與和諧都是大自然天地的節奏，誠如宋儒張載所云：「民吾同胞、物吾與也」。《西銘》程明道亦主張「天地萬物與己爲一體，元無分別」，見《宋元學案·明道學案，五》，此亦即道家所表達的豁達胸懷。

人活在世界上不是利慾的獵取者，生活應求品味和品質的提升，重視人文的薰陶和人格的修養，摒棄物化，獸化的人生，誠如孔子所主張之立己、立人、己達、達人之生存境界。人活著不單在養口，誠如荀子所謂必有所養，尤以養氣、養心、養性、養情、養才爲人類教育不可或缺的基礎。當今教育祇重培養職業人、爲求得謀生而得一技半職，生存哲學卻是高度的心靈教育哲學，也是人格陶冶的天人教育，使天人、群己，莫不融洽。

生存哲學不宜排斥宗教，宗教並非人民的鴉片，而是靈魂的清涼劑和生命的安頓。在神道設教下，使人畏其大畏，以及大畏民志。宗教使人「反求諸己」以達「成己」、「成人」、「立己」、「立人」的地步。宗教教育使人內心柔順、謙卑、安祥、有禮，中國古代禮樂之教，即在使人達到這種地步，而非今日財大氣粗、傲慢無禮、不敬天、不敬人，對事亦乏敬業的態度。宗教心使人疏通知遠，凡事高瞻遠矚，留有不盡之餘地，爲己、爲人皆有餘裕。一個未受宗教陶冶的人，可能心橫氣浮，凡事淺見；中國古代雖沒有西方式的宗教，但先民卻以敬天、畏天、敬大人、畏天命爲倡，在禮樂的薰陶下，使人知其所止，而不致有所墮越，這本是儒家教育的使命。至於道家精神，則使人飄逸、曠達、高瞻、遠矚，超然象外，捨其物累，樂乎天道，以上迴向之精神，做下迴向的事業，超世而入世、入世而超世、不落入任何巢穴，不樹立任何門檻、凡事本其高瞻，而不落入世俗的陋見，這也可說是宗教心的高度表現。

當今世代崇拜技術、以技術通天，以技術控制萬物，最後反落得人受自己所創設的技術的捆綁。當代人已經「物化」了，不再是所謂「萬物之靈」了。

溯自近代文明史，工業革命首先使勞動者物化，而當代的資訊信息，更使人目不遐接，人類生活方式也跟著外在化了，人類在資訊社會中，終日受媒體信息之傳播，人已失去了真吾，人人都成爲「他人」以他見代替己見，馴至人云亦云，社會上充滿了一片無真見之人。

俄國當代哲學家索洛維約夫寫《西方哲學的危機》，(The Crisis of Western Philosophy)美國當代哲學家勞倫斯·卡弘(Lorenz)寫《哲學的終結》(The Ends of Philosophy)都有見於傳統形上學無補於當今之世道人心，相繼地呼籲哲學在當代必須轉型。觀之西方近現代哲學史已由生命哲學而存有哲學，最近已有「生存哲學」的轉向，這所謂生存並不單指衣食男女之須，因爲生存需要境界，是以確立生存境界哲學，和合心物、統一主客、回歸真吾，重建人類文化的價值觀，與自然和諧相處，打破物競天擇的迷思，反弱肉強食之行徑，回歸真樸的人生，重思人生的意義，是爲至要。中國先聖先賢先教人如何正德，然後方能利用厚生，否則一味發展高度的工業文明、資訊社會、生化科技，強調知識經濟，只會使社

會陷入無比的緊張，正如德國詩人席勒(Johann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-1805)所洞察到的，工業化會使人成為「碎片化」。人，成了零件，人是工具，而不是具有靈魂，有生命氣息的人。老子教人返樸歸真，以天地為法方可長久。當人類以技術相互炫耀時，人正已墮入了莊子所預見的「吾聞之吾師，有機械者，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，機心存於胸中，則純白不備。」(見《莊子·天地篇》)又云：「功利機巧，必忘夫人之心」(同〈天地篇〉)。此蓋古聖先哲，早已料之。

中國古人以人是天地之心，《禮記·禮運》說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陰陽之交，鬼神之會，五行之秀色」。《說文》：「人，天地之性，最貴者也」。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：「民受天地之中生」。印度《奧義書》以「人為宇宙的部分」。這些說法都強調人在宇宙中的地位。當今，人類正走向現代文明的極限，人類的大災難，即伴隨著巨大的幸福而到來，不可預測的災禍已到處顯其端倪，生物恐怖主義，網路恐怖主義，暴力恐怖主義，全球性愛滋病的蔓延，太空核子武器的競賽，自然環境的污染，貧窮與財富的懸殊，足證科學技術與生產力高度的發展，倘無高度人文的教養，與宗教心的陶冶，人類的社會終必沉淪。

現代文明以征服自然為追求的目標，殊不知，人無論把自然征服到甚麼程度，也不能改變人是自然的一分子，也不能改變人的物質本性。自然與人本是相互依存的，當人類向自然予取予求，並無限貪婪之下，生物存在的危機，已愈益嚴重。人類破壞了自然資源和土地、水，和空氣，人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。現代文明正不顧物種間的相互依存關係，卻併命地以人定勝天，去無限開發自然，並以發展國家達到發達國家為榮，其結果終釀成悲劇重重。資本主義的超貨幣文化，正在引誘人們向無底慾望深坑中邁進。當今以人力賺錢似屬下品，惟有以錢滾錢的人方被認定是人上人，這與古聖先賢的所謂大人、大丈夫的理念相去何若千里？

人是什麼？人為何而存在？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究竟為何？美國哲人赫舍爾(A.J.Heschel)嘗著：《人是誰》(Who is man)⁷法國哲人格雷納(Paul Grenet)嘗著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與作用》⁸英國哲人麥奎利(John Macquarrie)著《人的生存》⁹都在在地針對當代的人心、人性而發出愴切的呼籲，並企圖引導當代哲學應走的方向。

亞理士多德以人是理性的動物，普羅泰哥拉斯(Protagoras 5B.C.)以人是萬物的尺度，但自十八世紀以來，非理性主義興起，對人理性的能力與限度加以質疑，深信人類有限的理性誤導了人類自己的前程，人的「命運」反因「理性」而受捆綁。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(Albert Camus 1913-1960)嘗說：「在這難以理解的有限世界中，人的命運從此獲得了它的意義。一大群非理性的人站了起來，包圍了它，直到終了。」「也許沒有那一個時代比我們

⁷ 赫舍爾(A.J. Heschel)著《人是誰》(Who is man?)原書為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 1965.按赫舍爾為著名猶太教哲學家、神學家，美國猶太神學院、倫理學和神祕主義教授。

⁸ 格雷納(Paul Grenet)為法國著名新托馬斯主義者，巴黎天主教學院教授。本文原載 Paul Grenet 著《托馬斯主義》一書中，一九五六年版。

⁹ 麥奎利(John Macquarrie)，英國當代著名神學家，曾先后任教拉斯哥大學，紐約協和學院，和牛津大學教授，本文選自氏著：“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” Chap. III, Revised Edition; SCM. Press. Ltd London, 1979。

的時代對理性的攻擊更加猛烈。」¹⁰

盧卡奇(Georg Lukacs, 1885-1971)在其名著：《理性的毀滅》裏，集中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中期以來這一理論的衝突。¹¹理性本非罪惡，祇因人類錯用了工具理性，而釀成了歷史上無比的悲劇和慘痛，當代哲學的轉型，正是為了讓「人之此在」，自我覺醒。

結論

新世紀的來臨，應是東方哲學抬頭的時期，尤其是儒、道二家思想的源頭—《周易》哲學重新出發的時候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信息和哲理，每卦都是相互旁通的，以宇宙自然整體觀，系統觀，集合觀，互動觀，協同觀，旁通觀作為社會人生的藍圖。任何時代，任何人群，倘違反了《易》卦的原理，未有不自招禍患的，吉、凶、悔、吝本在人的一念之間。《易》道教人「生生」，所謂「生生」，即一切人世事物，必須朝向生處，和生路上去發展，不要自掘陷阱，自築藩籬，或朝死路上去發展。人間的順逆、吉凶，本屬無常，有時求順反逆，求吉反凶，主要是眼光有所不及，為一時之利所蔽，而未計其長遠之害。

《易》教人從正反兩面深估發展的得失，因為宇宙中本同時存在著正反兩面的因素，舉凡順逆、得失、正反、否泰、損益之間，皆反覆無常，當思及《老子》與《易》道「反者道之動」之教訓，慎為因應。

六十四卦可看做一幅長江萬里圖，人活在自然之中，生活在這生命的長流裏，與萬物相共處，人和天、地、萬物，猶如一個圓環上任何相對的兩點，彼此循環過渡，互為因果，甲中有乙，乙中有甲，彼此相互涵攝，人的「主體」與自然的「客體」是相互圓融的，不容強分「主客」。人來到世上，不只是做「認識的主體」，在宇宙的蒼茫中，人仍然是細微不足道的客體，人應自知在宇宙中的地位，是與萬物並生，相互為一的關係。所謂「主客」和「主從」關係，本是人的自我設定，人跕處在地球上的某一平面，自認為主體，實屬狂妄。人祇在思想時作為認識的主體，或過道德生活時，自認為道德的主體，但此皆極有限。人作為思想的主體，未必能參透宇宙的奧秘，作為道德的主體，恆見其徒托空言，而未見其行事之深切著明處。《易》道教人主客互融，心物兼賅，勿以主體自居，人貴和謙，觀《謙卦》的教示，殊堪令人玩味，知謙則鬼神通之，萬方助之。

讀《易》觀象，貴能反映宇宙與自然之象，更能反映當今世代之象，並非囿於紙上的圖象，紙上的象是死的，事物的象是活的，讀《易》觀象，貴觀活象。《易》之語言、文字乃象之副墨，把卦象與文字結合起來，領悟其隱喻，方可領悟宇宙無窮之理，然後以之應用於社會與人生，方為生生之學。

先聖以《易》明於天之道，而察於民之故，聖人以此齋戒，故《易》是宇宙、天地、人事最高法則的學問，明乎天道，乃為察民之故，使民之故常與一切生活，能與天道配合

¹⁰ 見卡繆(Camus)著：《西緒福斯神話》。該神話著於一九四二年。

¹¹ 見匈牙利哲人盧卡奇(Lukacs)著：《理性的毀滅》(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)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Luchterhavd 1962，中文譯本見王玖興譯，山東人民出版社發行，一九九七年五月一版。

而行，並常存惕厲之心。順其道而行，庶幾無過。

當今世界文明建基於理性與高度知識之發展，但所作所為卻正違反理性，並缺少高瞻遠矚。世界列強，正以其利器獨攬世界，此正是走向死絕之路，而非以《易》道生生之教去指點蒼生。

本文，以《易》道生生之理呼喚哲學界，必須從傳統知識形上學的束縛中轉型，勿囿於知識論中理性，經驗之分辨，按理性與經驗乃彼此相契，理性經驗與感覺經驗不可分。理性中有經驗之因子，經驗中有理性之判斷，強分軒輊，實不可取。當今量子物理學以觀察者與被觀察者之參照系來決定觀察之結果，早已泯滅主客之別，而不重知識論之分析。吾人當放眼廿一世紀生存論之哲學，以重建人類的文化價值觀，并建構新世紀人類共存共榮之道，否則在唯科學主義之下，人文精神必然枯萎。而當代文明亦將面臨大浩劫。